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20

吴敬琏 主 编

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
乔治·施蒂格勒

市场设计和环境治理
约翰·麦克米兰

绿色GDP
乔·达姆斯塔特

经济学对环境政策的影响
罗伯特·哈恩

公司金融泛谈
姜 伟

法与经济学的三个流派
弗朗切斯科·帕里西

对高增长、低就业格局的初步研究
刘 鹤

改革基础产业
约阿尼斯·凯西德斯

日本的“建设中毒症”
阿列克斯·科尔

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评述
邓 钢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 编

20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20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9

ISBN 7-5086-0467-9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02509号

比较·第二十辑

主 编: 吴敬琏

责任编辑: 肖 梦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467-9/F·92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 ◆ ◆

主 编：吴敬琏

编委名单（按拼音排序）：

崔之元	高世楫	郭树清
焦津洪	李剑阁	林毅夫
楼继伟	卢 迈	钱颖一
荣敬本	王则柯	吴敬琏
吴晓灵	谢 平	许成钢
张春霖	赵人伟	周小川

◆ ◆ ◆

责任编辑：肖 梦

◆ ◆ ◆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 ◆ ◆

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
电子邮件: bijiao@citicpub.com
联系电话: (010)85322632
邮购传真: (010)85322631

卷首语

也许，眼下的石油价格飙升和能源紧张的局面是个好事，关心增长模式和环境保护的话题在各种媒体铺开，就是明证。有报道说，中华环境保护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97.5%的人赞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但有45.7%的人却不同意“为了环境保护，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其实，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说到底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政府角色的定位，是如何让市场设计得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拥有强国梦的民族，这一场关乎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肯定是极为重要的，也到了极为关键的时刻。这不仅仅是环保部门、能源部门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事，也不仅仅是地方官员如何摆正其“政绩观”的问题，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开始思考那些专家们早已探讨、辩论、设计的制度性的原则，以及背后的理论与细节。为此《比较》第20辑辑录了四篇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文章。

《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中的一小节。施蒂格勒的贡献在于对“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原因和效果”所做的研究，同时还分析了经济管制的途径，提出了管制者常常要受到被管制者行为的影响，即“管制俘获”问题。这篇短文特别强调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凡是个人和私人机构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都要移交给政府去解决，这种倾向似乎是一种天性。”施蒂格勒坦承道：“斯密，及其前辈和后继者们几乎总是致力于建议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头几十年里，我也是如此。”他说自己的研究发现之一是，“无论公共政策的初始目的多么公正，政策最终总是倾向于牺牲政治实力弱的团体的利益，来帮助政治势力强的团体。经济学家们不仅是政府管制问题的勤奋学生，而且他们也逐渐扮演着管制者的角色”。其中，他举出了美国“清洁空气法”的典型例子。

约翰·麦克米兰的《市场设计与环境治理》认为，一个设计良好的竞争市场，可以把资源配置到那些能够最好地利用它的人手里，因此，市场有时候是可以为公共部门服务的。市场不可能完全替代政府，但是在某些领域，它可以帮助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环境保护不可能完全交由自由市场去解决。被环境污染伤害的人通常拿排放污染的人没有办法，破坏环境的企业会给社会制造外部成本，却不会包括在自己的会计成本之中，所以企业并没有一个基于市场的激励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要想保护好环境，政府就必须加入进来，填补这一空白。文章介绍了美国引入“污染物排放配额制度”的例子，来说明这样一种市场设计帮助政府更有效地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让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政策目标。关于“污染权拍卖”的设计看上去很“技术”，对我们来说却是很重要的。

罗伯特·哈恩的《经济学对环境政策的影响》相信对读者了解这一领域有相当帮助。本文考察了经济学家对制定环境政策的影响，且集中讨论了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现象：一个是为了达到环保目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对激励机制的应用，比如污染排放许可权交易；另一个是在监管决策中，人们对应用收益和成本分析这样的工具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作者认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工具在环境、健康和安全监管的形成过程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政策会变得更有效率。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性，可以用环境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加以解释。我认为，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不应该简单地局限于出好点子来影响政策。他们还需要理解政治过程如何影响结果，还需要积极地将恰当而可行的经济工具推销出去，以促成更为高效的环境政策”。

近年来，国际上环保活动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们都对GDP和相关的社会核算体系表示失望，而这二者是国民经济表现的可靠计量手段，并因而作为政府重大决策的合理基础。批评意见集中认为，在计量GDP时没有反映以下两个重要现象：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损害。乔·达姆斯塔特的《绿色GDP：值得么？可行么？》文章认为，应该将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体系扩展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更好地为环境与经济的互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我们判断国家是否正在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消耗着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并且提供与不同规则、税收和消费模式所造成的影响相关的数据。

新开栏目“课堂笔记”因《公司金融泛谈》而起。这是一堂名副其实的关

于公司金融理论现状和发展的课堂笔记，对于阅读《比较》最多的读者——高校师生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文献综述和梳理。作者姜纬曾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米勒，于200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与经济系副教授，开设MBA、EMBA和博士生公司金融的课程，她曾经获得过EMBA优秀教学奖。确实，她在2005年6月16日为《比较》编辑室编辑们的讲课，是一次学术上的享受，我们将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在《比较》第7辑曾刊登过土居丈郎和星岳雄的《为“财政投融资计划”买单》的文章，分析和讲述了日本政府在70~80年代大力将国债、FILP用于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些项目和计划建设了不少或毫无效益或永远也收不回贷款的道路、桥梁和设施，计算了留下的巨大坏账。《日本——大兴土木的国家》可说是这一故事的延伸，作者阿列克斯·科尔是长期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以他的视角分析了匪夷所思的“土建国家”日本为什么那么热中于“换地”建设。在过去的50多年里，日本政府每年投入数十兆日元不断推进各种土木工程项目，诸如筑坝、海滨河岸侵蚀防护、洪水控制、道路建设，等等。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通过公共事业流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政治团体，为了维持政府部门之间的平衡，预算资金必须全部花光，计划规模必须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具体负责操办的政客可以获得非常诱人的好处费，通常为每个公共事业预算的1%~3%。而那些建筑行业的工人——原先的农民则依赖不断发展的建设业为生，整个日本经济因此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旦停止工程建设，就会有无数的人失业，从大兴土木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就会群起反对。从这层意义而言，日本是真的患了“建设中毒症”，除了不断加大药量，中毒症患者的生活将无法继续。当然，大兴土木给国土造成的环境上的毁灭，是作者刻意强调的另一个重点。

帕里西的《法与经济学中的实证学派、规范学派与实用学派》讨论和介绍了在法与经济学相对较短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的三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实证学派或称为芝加哥学派，规范学派或称为耶鲁学派，以及发端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实用学派。实用学派的发展为法与经济学提供了第三种视角，既不同于完全的实证学派，也不同于完全的规范学派。这些学派之间存在一些争论，伴随这些争论的还有各种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例如关于经济学分析在法律制度设计中所起的恰当作用，以及在政策分析中所使用的评价社会偏好与总福利的工具所具有的局限性，等等。本文对这三个学派的讨论无疑有助于激发人们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兴趣。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和低就业的总格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的《对高速增长、低就业格局的初步研究》一文分析了形成高速增长、低就业格局的主要原因及其不利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城市化、要素价格、劳动力流动、技术政策的实施等,是一篇资料翔实的形势分析文章。

世界银行专家约阿尼斯·凯西德斯的《改革基础产业:民营化、监管与竞争》是编委高世祥推荐的,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而言,怎样制定良好的监管机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文作者指出,近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些加于公用设施之上的、对竞争和所有权结构的限制并不利于公众利益。铁板一块的垄断性企业使服务极端恶劣。正是由于上述这些问题,过去20年间,基础产业方面的公共政策经历了重大变革。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对公用事业实施了意义深远的结构调整,包括对其中很多服务实行了民营化。文章引用了近来的经验性研究,对公用事业民营化及监管的分配效果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重要的潜在缺陷,即监管能力薄弱,以及一些具体挑战,如资费调整应适用何种标准、进程多快为宜,如何在竞争环境中促进普遍服务的提升。

王则柯教授的文章实在又是有感而发,谈了关于《民办教育的两个症结问题》,对于当前的大学教育可谓是忧心忡忡。他引述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的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一精辟话语,揭示了“大师”与“大楼”的基本关系,道出了大学的真谛,承认它是大学必须秉持的基本办学理念。

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然近来有不少学术出版物,但它依然是一个相对少受人关注的领域,当读者杨勇给我们推荐了《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评述》一文时,我们决定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比较》的读者。因为正如作者所说的:“经济史研究致力于理解历史长河中经济变迁的性质和结构。在过去的1 000年中,中国在疆域面积、市场广度、人口数量、技术发明范围、环境控制程度、制度的类型、政策或规划的多样性、国际影响范围等诸多方面达到了前近现代社会的巅峰。在历史面前,经济史学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从可供使用的丰富的历史资料来看,中国的历史几乎包括了经济史中所有的关键问题。在世界经济史研究中,中国的重要性和作用依然不可小觑,在21世纪,学术界会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史研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十辑

- | | | |
|----|--|---------------------|
| 1 | 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 | 乔治·施蒂格勒 |
| 7 | 市场设计与环境治理 | 约翰·麦克米兰 |
| 14 | 绿色GDP：值得么？可行么？ | 乔·达姆斯塔特 |
| | Greening the GDP: Is It Desirable? Is It Feasible? | by Joel Darmstadter |

前 沿

Guide

- | | | |
|----|---|-------------------|
| 23 | 经济学对环境政策的影响 | 罗伯特·哈恩 |
| | The Impact of Economics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 by Robert W. Hahn |

课堂笔记

Class Notes

- | | | |
|----|--------|-----|
| 59 | 公司金融泛谈 | 姜 纬 |
|----|--------|-----|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 | | |
|----|---|-----------|
| 77 | 法与经济学的实证学派、规范学派和实用学派 | 弗朗切斯科·帕里西 |
| | Positive, Normative and Functional Schools in Law and Economics | |

By Francesco Parisi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93 对高增长、低就业格局的初步研究 刘 鹤
- 104 改革基础产业：民营化、监管与竞争 约阿尼斯·凯西德斯
Reforming Infrastructure: Privatizatio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by Ioannis N. Kessides
- 125 民办教育的两个症结问题 王则柯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133 日本：大兴土木的国家 阿列克斯·科尔
The Land: The Construction State *by Alex Kerr*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s

- 149 最新中国经济史研究评述 邓 钢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by Kent G. Deng

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

乔治·施蒂格勒

想像这样一种情景：我们生活着的小镇街道脏乱不堪，到处堆满了纸屑、瓶罐和垃圾。对于这样的情形，作为个人，我们除了注意不要再火上浇油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在亲朋好友中发起一场运动，并给当地的报纸写信，但这种办法也仅仅是权宜之计而已：很快，运动的激情就会消退，又会有新的事情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看来要持续有效地解决类似这样的小问题，除了依靠政府力量外就没有什么其他可行的办法了。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小镇可以制定一项法规，禁止在街上乱扔垃圾并对明知故犯者给予处罚。更进一步地，小镇还可以雇人来清扫街道。以上的例子只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缩影。如果个人，或者由个人组成的一般机构（比如教堂、家庭教师协会）对问题无能为力，或者不能有效地处理时，除了政府我们还能向谁寻求帮助呢？除非一个人完全听天由命，否则政府必将扮演“最后的救世主”的角色。

凡是个人和私人机构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都要移交给政府去解决，这种倾向似乎是一种天性。私有企业的守护神，亚当·斯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常常悲叹越来越细的劳动分工使人的情感和技能越来越迟钝，而这两者较之所有其他因素对于保持自由人身份又是尤为重要的。所以，亚当·斯密要求政府（实际上是相当胆怯地要求）担负起唤醒或恢复国民勇气的职责。这对政府

*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述——乔治·施蒂格勒自传》一书。——编者注

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残酷的君主施行一项暴政，就可能将国民的勇气摧毁，除了自我约束外，政府的什么行为能重建一个社会的勇气呢？但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也并非政府的盲目崇拜者。在其巨著《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花了几百页的篇幅对英国18世纪实行的帝国保护主义（即重商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亚当·斯密，及其前辈和后继者们几乎都总是致力于建议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头几十年里，我也是如此。对于解释政府的行为、探寻政府某一特定政策背后的推动力等这样截然不同而又更具奠基性的工作，那时几乎就没有人做。当保护主义持久而泛滥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都热衷于向政府进行自由贸易的游说，这种游说持续了两个世纪。但是，促使政府实行自由贸易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没有人对此进行研究。

在对公共政策产生原因的解釋中，我們最近所了解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公共政策是由社会中的某些特定团体为其自身利益而量身定做的。但这种解释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詹姆斯·麦迪森（James Madison）认为政府的核心任务就是控制各个政治集团，并分散其权力。但他在解决途径方面也仅仅是提出了两个良好的愿望：一是要避免直接民主制选举产生的代表对少数人进行威胁和迫害；二是要避免政府规模过大导致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

解释政府行为的一般理论仅仅是在过去60年中才开始出现的。安东尼·道斯（Anthony Downs）、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以及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三位学者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对政府现实而非理想职能的理论研究由经济学家发起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但这绝非偶然。（尽管塔洛克的研究生学位是法律专业的，但我们也将其归为经济学家之列。）这是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只有经济学家拥有一个能解释社会行为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比起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更容易看到理性行为理论在解释政治现象方面的适用性及其必要性，因而自然也更容易将其并不熟悉的政治问题与他们的理论工具联系起来。1962年塔洛克和布坎南的书《同意的计算》出版，在此之后不久，我也开始了这一领域的工作。不过一开始，较之政府政策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我对经济管制的现实效应问题兴趣浓厚得多。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克莱尔·弗里兰德（Claire Friedland）也加入进来。

迄今为止，克莱尔已经与我共事近30年了。她作为一个难得的同事以及我在专业上的知己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此我深怀感激。计算机使得结果

的获取变得非常容易。如果第一次或者第二十次统计分析的结果都不理想，我们可以从数据中减去一个年份、加进一个新的变量以解释矛盾之处，或者对另一个变量取对数，等等，直到，哦，理想的结果出现为止！——这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克莱尔拿出一份零乱不堪的打印稿，递给我并郑重地说：“你还能从这个可怜的想法中看到价值吗？”这个时候我总是不敢看克莱尔的眼睛，回答说：“让我们再加17个变量看看吧！”我必须附带说一句，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天赋同时又最让人受不了的俏皮鬼！

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管制政策的效应问题我们做了三个研究。第一个旨在确定电费的政府管制是否对公用事业机构的电费标准存在显著影响。答案是：没有。我们在有管制的州和没有管制的州之间进行比较，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一结论在圈内引起了两种普遍的反响。一是“我们早就知道了”（那我们干吗不省点精力，问他们就好了？）；另一种就是认为我们的结论错了。事实上，不久之后格里格·贾雷尔（Gregg Jarrell）的工作表明早期的政府管制导致了电费的上升。第二个研究旨在考察，证券交易委员会大费周章地审查新上市证券的招股说明书，是否会显著改善投资者在新发行股票市场的收益状况？我们的答案仍然是：不会。这次我们的结论遭到了管制派经济学家们的怀疑和猛烈批判，但事后大量的研究都证实了我们结论的正确性。

第三个研究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反垄断法制定以后，美国经济的竞争性是否加强了？要回答这一问题，办法之一就是将美国与其他没有反垄断法的国家相比，我们尝试了这种做法。很快我们就发现，与美国的信息资源相比，国外有关公司和产业的信息实在太匮乏了！在美国，一周之内你就能获得钢铁行业各个公司丰富的历史产量数据，而在英国，仅仅搜集某个行业的基本数据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国外的商人们总是比较有保留。

1955年我曾经被带领参观浪琴制表厂，在郊区的时候，该厂的一个高级主管跟我说可以随便问什么问题。然而，当我随后问到和一个和盈利有关的问题时，这个主管就变得颇为恼怒，而此后的整个旅途都笼罩着可怕的沉默。无论如何，尽管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些结论，比如我们的反垄断政策使得美国经济的竞争性略微下降，以及降低了某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但这些研究结果最终只是尝试性的，且不太明确。这些有限的成果给我们带来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以上这些研究最突出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取得了什么结果，而在于它们都具有首创性。比如，当我们于1960年开始正式研究电费管制问题时，这个行业

已经被国家委员会管制53年了。而在此期间，关于管制效应问题，在大量的法律和经济文献中只能找到由20世纪基金会做的一个很粗浅的研究。再如，我们1964年开始探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评审问题时，我们的研究是这个组织成立30年以来首个与政策效应相关的研究。不过，在反垄断政策的研究方面，我们并不是最早的——在此之前早有成百上千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效应发表了看法。值得骄傲的是，我们与前任研究者们不同，我们的研究为后来者做好了奠基性的工作。比如，我们曾经对美英两国7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比较，谁要是对工作有足够的耐心的话，现在可以再增加10个或者100个行业。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有关政府管制效应的经济类文献丰富多了，每年的数量都在成百地增长。不久前，我在住宅建设文卷中查找有关高利贷法效应的文章，一下就找出了40多篇！

与圣丹尼斯的奇迹不同（他在被斩首之后，捡起自己的头颅飘然而去，引得伏尔泰因此感叹：第一步是最艰难的一步），第二步更富挑战：为什么政府会管制某些行业和行为，而对另一些却放任不管呢？农场主、工会、制造商、交响乐团、大学及其教授们——所有这些机构都在寻求并获得补贴、牌照、公共定价，以及凡是国家所能提供的其他好处。而另一方面，其他的行业和职业（如餐馆、中层商务经理、非熟练劳动力）则很少得到政府的援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尽管答案很复杂，也很难理解，但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个发现是无论是从单个来看，还是从总体上看，小规模组织往往比大规模团体具有更强的政治活动力。如今美国的农场主及其家属只占国内总人口的2%多一点，但他们却能从政府的收入稳定政策以及其他各种政府管制和特别项目（如农作物产量限制、优惠利率、电力设施补助等）中获得400亿美元的收入。早在1950年，那时农场主及其家属数量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5%，但他们从整个联邦政府支出中不过才获得30亿美元，远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的400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时期的95亿美元）。如果以不变购买力计算的话，农场主的人均收入增长了7倍。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团体比大团体有更强的政治活动力。首先，小团体往往更具凝聚力。相对来说，组织活动、募集游说基金、通知各种信息在小团体中都更易进行。在美国只有约7万名聚集在西部几个州的养蜂者（是的，他们拥有一个联邦项目），但是却有数百万的蜂蜜消费者。其次，小团体中的每个成员进行政治投资都是非常合算的，因为成功后获得的收益将会更大。每个

养蜂者从联邦项目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每个纳税人损失的几百倍。

另一个发现是，无论公共政策的初始目的多么公正，政策最终总是倾向于牺牲政治实力弱的团体的利益，来帮助政治势力强的团体。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基本法中有一条禁止条款：无论一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是好还是坏，任何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的新投资都禁止进行。我的同事，彼得·帕希吉安（Peter Pashigian）发现，政府制定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北部地区的产业向南部和西部转移，而且他还发现国会中针对这一政策的赞成派和反对派正好印证了上述结论。然而，对整个国家而言，禁止不会造成污染的公司在地区间流动完全是一种无效的举动。此外，该法规中还有这么一条规定：所有的烧煤厂和发电厂都必须安装除硫装置以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在减少西部低硫煤的使用，从而使东部高硫煤矿受益，因为如果使用西部煤根本就不用安装除硫装置。因为这条法规，很多新型发电厂的建造和对旧厂的关闭都延误了，空气污染也因此增加了。降低空气污染，这一令人想往的社会目标，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特殊利益政策而变得遥不可及。

经济学家的上述发现都很具有代表性，这些发现明确地告诉我们，政治影响力强的团体往往能有效地利用国家政治程序增进其自身利益。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嫉妒的败北者将抱怨连连。当然，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比如，如果我们为了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投入超过所需的资源，东部煤矿主和经营者所获得的收益就会小于全国其他人的损失。我们可以以一个相当小的代价，既减少同样数量的污染物排放又能生产同等数量的电，这样矿主们的收益就比电力消费者的损失小了。但是也有可能的是，如果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必须支持阿巴拉契亚的矿主们，那么这也是不亚于其他任何一种方式的做法。

经济学家们不仅是政府管制问题的勤奋学生，而且他们也逐渐扮演着管制者的角色。我自己的经历比较简单：在证券投资保护委员会成立的头3年（1970~1973年）里，我是公众代表之一。在该委员会中，我也是唯一的经济学家，其他成员都是由经纪业的人员和公务员组成。我的任务就是对一些琐碎的管制细节，如经纪人应将证券投资保护委员会的标识放在哪儿）提出反对（有时候会奏效）；还有就是根据经纪人的资本组合风险对经纪人给出不同的评价，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尝试。来自经纪行业的委员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获得薪酬，这样就可以避免与联邦政府雇员有关的繁琐不堪的管制，我也因此搭上了这一

政策建议的便车。

对于经济学家中扮演过重要而显著的管制者角色的人，我们可以列出一份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单子。这儿只是少数几个：

阿瑟·伯恩斯 (Arthur Burns)：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乔治·舒尔茨 (George P. Shultz)：劳工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以及国务卿

达里乌斯·加斯克尼斯 (Darius Gasknis)：州际商务委员会主席

詹姆斯·米勒三世 (James C Miller III)：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行政管理
与预算局局长

阿尔弗雷德·卡恩 (Alfred Kahn)：民航局主席

在这个名单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除阿瑟·伯恩斯赞成工资和价格管制外，其他的经济学家都是非管制经济和自由市场的忠实拥护者。我倒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支持自由市场；毕竟，亚当·斯密在晚年曾长期担任苏格兰海关委员一职，并一直致力于打击走私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 李淑萍译)